

國際知識小叢書之三

梵蒂岡的政治活動

施 坦 因 等 作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國際知識小叢書之三
梵蒂岡的政治活動
施 坦 因 等 作



大衆書店印行

國際知識小叢書

梵蒂岡的政治活動

(全五冊之三)

定 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再版——

| | | | | | | |
|-----|--|-------|-------------|-------|-------|-------|
| 編 者 | 魏 文 潤 | 發 行 者 | 大連市浪速町二三三番地 | 印 刷 者 | 總 經 售 | 分 銷 處 |
| 電 話 | 理 事 部 二一三五九二三七 出 版 部 二一三七六三一 營 義 部 二一一六八四二五號 | 大衆書店 | 大通市大江町二番地 | 大衆印書館 | 新文化書店 | 中華印書局 |
| 電 話 | 理 事 部 二一三五九二三七 出 版 部 二一三七六三一 營 義 部 二一一六八四二五號 | 電 話 | 大通市浪速町二三八番地 | 電 話 | 電 話 | 電 話 |
| 電 話 | 理 事 部 二一三五九二三七 出 版 部 二一三七六三一 營 義 部 二一一六八四二五號 | 電 話 | 大通市浪速町二三八番地 | 電 話 | 電 話 | 電 話 |
| 電 話 | 理 事 部 二一三五九二三七 出 版 部 二一三七六三一 營 義 部 二一一六八四二五號 | 電 話 | 大通市浪速町二三八番地 | 電 話 | 電 話 | 電 話 |

目 次

- 梵蒂岡的政治活動 施 坦 因 (一)
梵蒂岡與戰後整理問題 米爾尼柯夫 (二四)

梵蒂岡的政治活動

施 坦 因

「梵蒂岡」，「教皇」，「羅馬教廷」，「神聖皇座」等字常引人回憶到中世紀時代，那時候羅馬各教皇領導強大聯盟，向日耳曼諸皇門下，廢棄了幾個國王而將他們趕出教會之外。直到現在，爲了表示政治上的投降，還存留着一句話：「到甘諾斯去」，它的意義就是說在公元十一世紀時，與日耳曼皇亨利四世鬥爭的教皇葛利郭里七世強迫他站在甘諾斯的城門邊，卑怯地懇求讓他完全投降。

羅馬教皇的政治威力的時代早已進入歷史的範圍。一八七〇年意大利軍隊佔領羅馬之後，教皇就如衆所知的，喪失掉了世俗的政權了。教皇的領地歸併於一個羅馬城內，而不成其爲國家了。教皇庇護士九世在一八七〇年後被關閉在梵蒂岡宮中，他宣誓（並保證以後的教皇）自登位到死亡止，不從那兒出外一步。·宣佈自己是一梵蒂岡的囚徒。·

從此產生了一種流行的概念，似乎說梵蒂岡在十九世紀末葉起就不過是天主教的高級教會，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宗教性質的組織，而對於國際的政治與外交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然而「梵蒂岡的囚徒」自己却時常用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來反駁這種歪曲的見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梵蒂岡形式上保守着中立而實際上却企圖影響二大陣營鬥爭的結局。梵蒂岡的外交活動是非常小心的。在戰爭的每一個階段中，它終站在那時最強大的一方，而同時却並不與另一聯盟斷絕關係。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時，教皇本納狄克特十五世曾企圖出任爲調解人。本納狄克特十五世奔忙折衝並在德國外交的影響下，呼籲媾和。這種提議事實上目的是在幫助德帝國主義，拯救它免除不可避免

義的崩潰。梵蒂岡的外交——這是很獨特的——成功地使德國方面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英、法方面媾和了。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梵蒂岡的外交政策對蘇維埃國家是有系統地懷着敵意的。在武裝干涉時期，特別是一九一九年蘇波戰爭時，梵蒂岡的外交站在波蘭背後，煽動它進行反蘇的勢不兩立的鬥爭。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中，梵蒂岡領導了有名的「反蘇十字軍」的政治運動。這是無數企圖恢復武裝干涉政策的嘗試之一。

在盛行聲名狼藉的「不干涉政策」的時候（一九三三——一九三九年），梵蒂岡拚命鼓動當時的英法統治階層去與希特勒妥協，而且鼓動德國侵略者轉向東方進攻蘇聯。在蘇芬戰爭中（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梵蒂岡是公開支持芬蘭的。

全世界天主教會是這樣強大的組織，據梵蒂岡的官方統計全世界有三萬萬四千八百五十萬名教徒。梵蒂岡依靠了自己外交政策的協助，把天主教會的社會政治利益當作教主本身以及它內部領導階層的利益來保衛。

在論到這對外政策的內容和方法之前，應該先略述一下梵蒂岡的組織。它目前的法律是由一九二九年拉特蘭條約所規定的，依據這條約羅馬教皇復得了一八七〇年所失去的政權。

教皇的政權祇限於梵蒂岡境內。因此從一九二九年起梵蒂岡被承認為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是世上最小的國家。它的面積在四十五分鐘內就可以環繞一週了，它的國境圍有高高的磚牆。這磚牆鄰接着聖彼得大寺院，是一中世時代的建築，其實梵蒂岡的領土祇是一群宮院的建築，宮院之間有一個梵蒂岡公園。居民（正確些說，梵蒂岡籍的人民）的數目，約為一千人（按一九四一年的報告為九六三人），其中五分之四是意大利人，五分之一是瑞士四個天主教區的居民所組成的瑞士近衛軍的兵士。編入近衛軍的都是十八至廿五歲的獨身男子，而且都有一定的高度（五呎十一吋以上）。近衛軍的「參謀部」是由上校，中校，少

校，上尉各一名及少尉兩名組成的。除瑞士近衛軍外，屬於「梵蒂岡武裝力量」的還有一榮譽教皇近衛軍，「服務其中的都是羅馬貴族子弟及梵蒂岡有關人物之後裔。

欲取得梵蒂岡國籍者須經教皇親自許可，並且這種國籍不能承繼於後人。

一九二九年莫索里尼與庇護十一世之間簽訂的拉特蘭條約中制定，「梵蒂岡國」位在羅馬城內，領土面積等於一〇八英畝。

假使教皇相等於一國的元首，那末由七十個紅衣主教所組織的「神聖會議」是在獨特的「政府」中有一時在法律評議會中，起着重大作用的。一九四四年時該會議中的民族成分是這樣的：二十七個意大利人，四個法國人，三個德國人，二個西班牙人，二個美國人，還有九個國籍不同的紅衣主教：比利時人，波蘭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愛爾蘭人，加拿大人，敘利亞人，阿根廷人及英國人。因此，在「神聖會議」中，現在實際上祇有四十七個會員。這是常有的現象，每一個教皇都命令留下幾個空席給自己的承繼者，而這些承繼者常常在開始統治時任命自己的擁護者。絕不是一切紅衣主教都直接參加梵蒂岡的統治的。起着特別作用的是梵蒂岡國務卿兼外相的紅衣主教。此外，他還是教皇最親近的助手及首席顧問。在前皇逝世以後，常常是梵蒂岡的國務卿被選爲新教皇的。

特別有趣的是梵蒂岡全力運用於主要機能之一，明白點，即任何國家的外交活動的形式，他以積極的或消極的形式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也就是說，在各國政府中有它自己的代表，而在自己國內則有外國的外交國。

駐梵蒂岡的外交團約有四十個國家：阿根廷，比利時，巴西，智利，德國，哥倫比亞，法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波蘭，葡萄牙，大不列顛，中國，匈牙利，里比利亞，摩納哥，愛爾蘭，古巴，危地馬拉，薩爾瓦多，聖瑪林諾，赤道國，烏拉圭，立陶宛，馬爾太，羅馬尼亞，委內瑞拉，芬蘭，海地，尼加拉瓜，巴拿馬，陀米尼加，哥士達黎加，洪都拉斯，美國也派有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特別耐人

尋味的是其中十三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和芬蘭等，他們與梵蒂岡的樹立外交關係還是在第二次大戰之後。這是極可注目的。

在上列各國的政府中，梵蒂岡也派有自己的大使和公使。還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中，教皇的代表（聖使）就相當於大使等級而教皇的特使就相當於公使。那時還制定一種法規，依照這個法規，教皇的大使——聖使——有權算是外交團的「首領」。這個法規至今還遵守着。

梵蒂岡的其他的國家機能約有下列幾種：它有與意大利貨幣相等的自己的貨幣，這種錢幣有自己的郵政（印花，郵票等等），有自己長約四分之三公里的鐵道，還有自己的電台。

所有這一切都帶着一種小玩具的性質，然而講到梵蒂岡的財政和預算却並不這樣了。預算是總不公佈的：教皇深深地保守着他收支的秘密。在預算的問題上，教皇確是個專制君主，他是不向任何人報賬的。因此關於梵蒂岡的收支，關於它的財富都沒有任何準確的材料。不過這些財產是很大的，而且有一部分甚至於是沒有價的。

現在我們且回到梵蒂岡的外交問題上去。一切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建基於情報之上的，沒有了它就談不到什麼對外政策。

從政治情報的來源及內容上說來，梵蒂岡是處於非常享有特權的地位的。上面已經說過，散在世界各處的天主教徒約有三萬萬五千萬人。正因為如此，所以梵蒂岡的外交可以通過這些路徑去獲得任何其他的人都得不到的情報。

除了經過自己駐在數十個國家內的大使，公使等而獲得外交情報的正常道路外，梵蒂岡還經常地從全世界一千三百名主教那裏獲得它所需的情報。主教們則從又那些隸屬他們之下的，與人民有直接關係的牧師們那兒取得情報。天主教會裏經常舉行的「懺悔」也是重要政治情報的重要來源。最後，也不能輕視無數宗教團體的佔用（參密尼克派，耶穌會，聖芳濟派等）。在第二次大戰前幾年，羅馬外交團體中的「耶

蘇會教團的將軍」被認為是「世界上情報最多」的人。

梵蒂岡的干涉國際活動是以教皇的文告或公開演說的形式，更多則是以祕密外交的形式進行的。這種活動是在任何公開文件中都不會反映出來的。教皇使者所轉遞的外交文件，他們與其他國家人員談話的內容，在任何地方都不發表的。梵蒂岡對各種國際問題公開表示的意見是登載在他的官方報紙「羅馬觀察者」上的。這報紙的編輯是有組織地受着教皇自己或國務卿的指揮的。



梵蒂岡的外交在第一第二和兩次世界大戰中是怎樣表現的？它在現階段中佔着怎樣的地位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革命運動烽起時，梵蒂岡的處境是很困難的。

意大利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時革命的浪潮掀得極高。這也推動了梵蒂岡去幫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因為它害怕鄰近發生的革命的前途。在這裏，梵蒂岡方面也是以他們所有的小心去活動的。它避免一切公開的演說和正式的文告。當梵蒂岡對法西斯運動加以堅決的援助時，它在表面上却裝出對意大利的內政問題毫不關心的樣子。但是法西斯黨剛剛一得到大權（一九二一年十月廿八日），梵蒂岡就立刻嘗試與它締結政治協定。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當時的梵蒂岡國務卿加斯巴里紅衣主教已經與莫索里尼有過祕密的會見了。正在這個時候，羅馬銀行因種種原因而頻於破產了。雖然法西斯黨提出了反對「銀行壟斷」的煽動性的口號，然而莫索里尼仍舊同意拯救梵蒂岡的財政，使它免於破產（這使意大利國家化了十五億里拉。）而加斯巴里則答應以梵蒂岡的政治援助為交換。這個協定就是使那在梵蒂岡影響之下的「人民」黨一開始就對法西斯制度加以援助的。

當一九二四年時，領導過非常熱烈的，反法西斯運動的社會主義代表瑪台奧蒂被殺之後，莫索里尼的地位也開始動搖了。梵蒂岡因他的請求而將戰略指示給「人民」黨，這種戰略緩和了反法西斯的鬥爭，並

且戰勝了反對派。

梵蒂岡與法西斯主義在作了這種合作的嘗試之後不久，就開始進行談判，談判結果在一九三九年締結了拉特蘭條約，這是一種雙方互利的協定。雖然教皇的政權及於極小的區域內，然而這政權已得到了形式上的承認，這對於梵蒂岡在恢復數千年來的傳統上是很重要的。除了這種觀念上的利益之外，梵蒂岡還得到了很實際的經濟利益。法西斯政府交還他許多以前屬於教會的宮院和建築，甚至還承認其中的一部份享有治外法權。而這些財產之位於梵蒂岡國境外者，也受它的管轄。此外，梵蒂岡還獲得了一筆鉅款——十億零七百五十萬里拉——作為補償一八七〇年被割入意大利王國的土地之損失。最後，拉德蘭協定還恢復了在意大利學校中教授宗教學的義務把青年的教育事業轉交給天主教的僧侶。然而正因為此，在以後的幾年中，法西斯政府和梵蒂岡之間就產生了很大的衝突：莫索里尼反對天主教的僧侶們，也不願意從自己手中讓出青年的教育事業。

梵蒂岡在拉德蘭協定中所得到的巨大利益是以它應允對意大利法西斯黨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給以政治援助為交換條件的。

差不多和拉德蘭協定同時，梵蒂岡也與希特勒及他的助員們親近起來了，還在一九三〇年時，當時教皇派往柏林的聖使巴且里紅衣主教（即現在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就指示那處在梵蒂岡影響下的德國天主教中央黨，命令它去和希特勒接近，並且聯合政府準備好基礎。

希特勒黨徒奪取政權時，巴且里紅衣主教已經是國務卿了；他訓令中央黨的領袖凱斯主教甚至如果中央黨必需解散的話，也不要去做反對希特勒政府。為了與希特勒妥協，梵蒂岡甚至準備實行這樣的犧牲了。

一九三五年，莫索里尼侵入阿比西尼亞。對於這種國際強盜和暴亂的行為，教皇庇護十二世連一句責難的話都沒有。相反地，梵蒂岡對於莫索里尼政府因受國聯的經濟制裁而感到的困難，加以財政上的援助。這種財政的援助當然是很秘密的。

梵蒂岡在意阿戰爭中所取的態度以及庇護士十二世在戰爭結束，和奪得阿比西尼亞之後祝賀莫索里尼「勝利」的事變。引起了甚至他自己天主教陣營中的不滿。例如，天主教歷史學家賓奇教授在一九四一年寫道：「對於那被五十餘國宣布為是法律的破壞者和侵略者的國家的軍事勝利認為是歐洲和全世界真實和平的序曲，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梵蒂岡方面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及希特勒主義之間的政治關係絕不是友好無間的。但是謙讓和衝突在後來的時間期中並不是由於梵蒂岡政治觀念的立場之改變而是由於他們直接利益衝突。

在與莫索里尼締結拉德蘭條約之後不久，教皇又與希特勒政府締結了特別協定，即所謂《Concordat》者，企圖以之來鞏固天主教會在德國的基礎。而後來雖然天主教徒在德國受到有組織的迫害，梵蒂岡却仍舊致力於維護與希特勒的友好關係。

因此在一九三三年的聖誕文告中，庇護十一世力避公開議論希特勒政府的反天主教政策。在一九三六年的神父告示中，德國的主教們說：『盡管別人對我們還有着不信任，我們，天主教徒，還是準備做一切應當為國家做的事，我們準備協助元首去反抗布爾雪維克及其他的工作』。而為了獎勵這樣的「忠誠」起見主教們要求「今後不應該灌輸青年與人民這種思想：在征服了國家的第一個敵人布爾雪維克之後，天主教會就被認為是國家的第二個敵人』。

但是希特勒黨徒並不歇手：德國天主教會的壓迫到一九三七年仍舊繼續着。最後，教皇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廿一日的特別文告中不得不提出抗議了。但是在這以前三天，三月十八日，教皇曾公佈過另外一個文告——反對「盲目的唯物論」和「無神的共產主義」，——這較諸希特勒的「訓諭」還要激烈的反天主教政策也不能動搖梵蒂岡的一般立場，因為這對於它此了天主教在僧侶德國的地位更其重要。

就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那幾年中，梵蒂岡與莫索里尼及希特勒都保持着密切關係，並且，特別還援助了西班牙的武裝干涉。不難猜想，即期對反對西班牙政府的暴動準備是在梵蒂岡協助之下進行的。

在這準備工作中起有顯著作用的是西班牙天主教領地赫爾·羅勃來斯。梵蒂岡的各種組織，及他的報紙都全力支持法西斯的叛亂，說這「是拯救基督文明的鬥爭」。

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侵吞奧地利時，梵蒂岡所取的態度，對於它的外交政策是很能顯它的特點的。因為希特勒的反天主教政策，當然應該竭力反對的強佔奧地利的。但是結果怎樣呢？

佔領奧地利之後不久，維也納的紅衣主教英尼采爾在希特勒黨徒們扮演「人民投票」時，公開地號召選舉希特勒。是的，庇護士十一世會召這位紅衣主教到羅馬去解釋，後來「羅馬觀察者」報上登載了一篇非難佔領奧地利的文章；但是這篇文章完全沒有反映出梵蒂岡對這個問題所抱的實際的政策。從梵蒂岡各界得知，教皇對於英尼采爾的不滿並非爲了維也納紅衣主教的態度而是爲了他表現得太露骨、太公開的原故。而目前——對於奧地利，梵蒂岡的特殊利益已經犧牲給它的一般反人民政策的立場和它援助侵略的方針。

梵蒂岡外交的本質也可以從它和莫索里尼相互關係的歷史上來判斷。梵蒂岡和法西斯帝之間由拉特蘭條約而鞏固起來的密切關係，在戰前的最後幾年中因兩個爭執而顯得暗淡了。我們所以用「暗淡」這個字，因爲梵蒂岡在基本上是滿意這個協定的。庇護士九世會不惜褒獎和稱許莫索里尼，稱他爲「自天而降的人」。爭執的發生是由於莫索里尼嫉妒梵蒂岡的重大利益。依照拉特蘭條約將青年的教育事業轉交給天主教僧侶之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後來幾年之中就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以反對條約中的這一部份。對各種天主教的組織，特別是對天主教的宣傳機關的壓迫就開始了。教皇提出了抗議。在「羅馬觀察者」報上刊載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結果爭論是以妥協結束的：雙方都退讓一步。

第二個爭執的發生當莫索里尼在一九三三年依照希特勒的直接命令在意大利實行人種法以反對猶太人和阿比西尼亞人的時候。人種法抵觸了傾向世界主義之天主教會的基本利益。「高等」和「低等」種族的

區別便在不同國家和種族間的宣傳困難起來。這就是爲甚麼梵蒂岡要出面反對莫索里尼了。不過，這也僅限於文字上的論戰而已。任何更嚴厲的反對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種族野蠻主義的抗議梵蒂岡並沒有提出。

一九三九年三月有大外交家之名的巴且里主教（現今的教皇庇護十一世）即位。在他的經歷中確實有許多外交上的任務，是被他用藝術的手腕完成的。在前皇庇護十一世朝任國務卿時，他實際上已領導了梵蒂岡的一切內政和外交。

起先庇護十一世試圖與希特勒黨締約。當時，他是柏林的教皇聖使。因爲他極熟悉希特勒黨，所以他特別繫望於自己與他的私人關係上。然而這個企圖並沒有成功。希特勒對於德國天主教會和天主教僧侶的權利問題一步也不肯退讓。梵蒂岡有失去自己在德國的勢力的威脅了。另一方面，梵蒂岡很明瞭戰爭即將來臨。它應該對於這個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公開準備的不可避免的戰爭嚴陣以待。

在這個時期，梵蒂岡外交的基本路線是努力於反蘇的勾當，同時企圖在侵略國德意和英法之間進行「和平調解」。還在一九三八年時，梵蒂岡在庇護十一世的前皇時就全力支助了「綏靖派」。一九三九年五月，庇護十一世訓令自己的外交代表們協力在梵蒂岡的旗幟下召集「五強會議」（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和波蘭）。因此那時教皇從德波關係出發，企圖對波蘭也來一個曾經決定對捷克命運的「慕尼黑會議」。

同時，「羅馬觀察家」報上也展開了廣泛的反蘇運動，煽動聯合歐洲各強國以反對蘇聯。梵蒂岡當時的這種外交活動及它的立場是與「不干涉政策」的基本路線一致的。梵蒂岡已成爲反蘇陰謀的中心之一了。

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中，衆所週知的開始了英法蘇關於建立「和平陣線」的談判。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英國「每日先驅報」說道：「梵蒂岡憂慮英法間的談判，因爲它的政策是建立反蘇同盟」。然而梵蒂岡的這種「憂慮」很快就消失了：不論張伯倫或是達拉第都絕無誠意建立「和平陣線」。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的進攻波蘭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開戰的形式，當然，對於幻想著「反蘇十字軍」的梵蒂岡是不甚歡迎的。庇護士十二世企圖干涉波德爭執，想在最後關頭阻止戰爭。失敗並沒有使他動搖。他同意在戰爭已經開始之後，出任為調解人。一九三九年九月莫索里尼請求教皇去影響倫敦和巴黎來締結和平。庇護士十二世計劃了適當的步調，然而大家都知道的，這並沒有成功。依照梵蒂岡的觀點，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發動的戰爭不是它所願望的，因為這個戰爭並沒有偏向反蘇，因此，由芬蘭軍閥煽動的，蘇芬邊境的戰爭就引起了梵蒂岡反蘇活動的新爆發。「羅馬觀察家」的攻擊蘇聯更其尖銳。梵蒂岡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公開宣稱「蘇聯侵犯芬蘭」並且撥給他的副司教羅賓以大量的金錢，「以便分配給貧窮的芬蘭天主教徒」。教皇的副司教在芬蘭找到了多少「芬蘭天主教徒」，這很難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梵蒂岡的政策特別複雜。梵蒂岡非常關心地注視着各鬥爭力量之變化的相互關係，並且適當地向這種變化而活動。它很明瞭，希特勒的勝利及希特勒德國獨霸世界企圖對於天主教會是什麼意思。但是在戰爭的第一時期，梵蒂岡的外交還沒有確定的方針。一九四〇年二月庇護士十二世接見派到梵蒂岡來的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泰洛爾。從此美國和梵蒂岡樹立了外交關係。泰洛爾與庇護士十二世的談話好像是論及是否可能壓迫莫索里尼，使意大利避開戰爭。

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庇護士十二世也接見了李賓特洛甫。許多報紙都證明，希特勒的外交部長是在探索（雖然這柏林會否認過）在梵蒂岡調解之下能否締結和平。有許多間接的理由可以證明庇護士十二世並不反對調停的工作。李賓特洛甫的另外一個目的可能是與庇護士十二世談判梵蒂岡對戰爭的一般態度。但是不久庇護士十二世竟公開責難德國人的進攻挪威（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庇護士十二世正式宣佈教皇決定對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鬥爭，給以正義的援助。最後，在同年五月底六月初時，梵蒂岡同意了美、英、法的阻止意大利與希特勒合作而參戰的企圖。為了這個目的，庇護士十二世會簽出了致莫索里尼的私函。

而另外一方面，幾乎就在法國崩潰之後，梵蒂岡承認了維希政府，並且開始和它談判關於廢除戰前法國的反對僧侶的法律。這個談判順利地結束了：維希的教育部長廢除了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五年關於青年宗教教育的法律。

在法西斯軍隊進攻蘇聯之後，莫索里尼立刻訓令意大利駐梵蒂岡大使阿托利珂向教皇游說，使他提出「反共產主義十字軍」的公開口號。出乎莫索里尼意料之外，庇護士十二世拒絕了他。這是不是說梵蒂岡敵視蘇聯的態度改變了呢？完全不是的。在自己對蘇聯的敵對狀態下，庇護士十二世所以抑制這種行動，是因為它顧慮到希特勒戰勝蘇聯時，他的獨霸世界的企圖將威脅到天主教會的這種直接後果。

庇護士十二世的拒絕頌揚「反布爾雪維克十字軍」，引起了莫索里尼方面的壓迫。梵蒂岡處於法西斯警察的監視之下，它和外界的聯絡非常困難。

雖然估計到希特勒同盟的勝利對於天主教會將有極大的危險，但是教皇並不站到反希特勒聯盟方面來，而却致力於侵略者和反希特勒聯盟間的「妥協和平」的事業。

一九四三年二月，紐約天主教斯貝爾曼——著名的「妥協和平」的擁護者——到梵蒂岡，那時意大利駐梵蒂岡大使是前外相齊亞諾。莫索里尼特別任命齊亞諾，是為了要在梵蒂岡舉行若干意大利退出戰爭的談判。這是在絕境中拯救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最後企圖。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的時期中，梵蒂岡繼續努力於締結「妥協和平」。希特勒軍隊的佔領羅馬也沒有改變這個路線：梵蒂岡仍舊保持着與外界聯絡的可能。這時它的外交活動較任何時候都秘密。但是在世界各國的報章上仍舊常常透露出准許發表的報告。

例如，大家都知道的，梵蒂岡曾為弗朗哥展開巨大的活動，以免他的破滅。西班牙外長霍爾唐的「和解」企圖在一九四三年曾經梵蒂岡的同意和援助。現在梵蒂岡對弗朗哥西班牙的計畫更複雜了。這個計劃就是企圖復興西班牙的君主政體，建立神聖拉丁同盟，參加者將有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葡萄牙。在這

聯盟裏，神聖君主政體的西班牙，在梵蒂岡的全力協助下當然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最近，梵蒂岡還計劃建立以最後的奧王下爾的兒子奧多·哈普斯堡爲首的奧地利巴伐利亞特別君主政體。

正如我們所看到，梵蒂岡的外交在戰後和平組織的「創造計劃」中也是看不出缺點的。不久以前，梵蒂岡發表了全部戰後的綱領，裏面包括許多預備普及到愛好自由國家的廣大人民集團中去的口號：號召與英美民主國家聯盟，必需消滅希特勒主義，宣佈各弱小國家獨立。好像這種口號是真正爲了在血腥的希特勒制度的鬥爭中緊張起一切力量的愛好自由民族而提出的。然而就在那個梵蒂岡的戰後綱領中，我們也看見了這樣的口號：東歐和中歐各小國建立同盟。這個標語在它堂皇的外表之下實際即是宣傳建立反蘇聯盟和重演反蘇防疫地帶之見。多回憶。

這還在其次，在「消滅希特勒主義」的口號下究竟隱藏着什麼呢，這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庇護士十二世的聖誕廣播中暴露出來了。教皇演說「真正的民主」，照教皇的意見，這完全不是在於實現民意；實現民意之後，他說，自由就變成了專制的暴政了。「它成爲虛偽的標語，它給人類的感謝衝動及消滅別人的本性以完全的自由。」後來他又議論「民主的空想」，終之，教皇所批評的完全不是希特勒主義，而是民主制度，教皇企圖將它的信譽掃地。

在那個廣播中，庇護士十二世也述及建立國際和平及安全機構的問題。他甚至贊成必要時的經濟制裁和武裝干涉。然而這裏他也添加道，這個組織「無論何時不應該不公平，不應該破壞法律去損害人民，不論這些人民是屬於勝利國，屬於戰敗國，或是中立國的。」這已經是爲希特勒黨而作的頑固的呼籲，這是用一切方法來預防對希特勒德國的「不公正」的企圖，這是卸除德國對它一切罪惡所應負的責任的企圖。

很特別，在講到希特勒政府時，庇護士十二世提起：某幾個政府「對戰爭也應負責。」因此，庇護士

十二世對德國因人類所流的血而應負真正的責任表示懷疑。

這一切引證已經足夠明白教皇文告的全部政治思想了。

最後，蘇維埃社會也不容許梵蒂岡及它的外交公開和積極地援助那些躲在倫敦和企圖組織阻礙民主和自由波蘭之建立的流亡政府反動派。為幫助阿爾契雪夫斯基及其黨羽起見，「羅馬觀察家」有計劃地進行了反蘇的煽動和宣傳。

梵蒂岡的對外政策和外交仍舊是忠於自己的。在希特勒德國最後完全崩潰之前夜，梵蒂岡就企圖拯救它免受公正的報復。

從這種企圖看來，梵蒂岡戰後和平組織和「根絕希特勒主義」的口號，顯得特別虛偽。

梵蒂岡與全世界關係之廣泛和多樣，它對於許多國家中的大量天主教人民的影響，它的外交工作的秘密方法——這一切都是非常危險的。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必需小心地研究和觀察教皇的對外政策。人民大眾都應該知道梵蒂岡外交的本質和目的。